

第一百二十一回

柳条湖突起狼烟 奉天城骤落虎口

话说公元 1931 年 9 月 18 日黄昏，沈阳北关外的高粱地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驻扎中国东北的奉天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川岛正夫大尉的部属，正朝着南满铁路开去。在河本末守中尉率领下，他们来到沈阳以南约 7 千米的柳条湖村，在距北大营 800 米处的路轨旁停了下来。

河本一挥手，士兵们在铁轨旁开始刨坑。还有几个军士就近警戒，集中监视着东面的东北军营垣——北大营。河本不时按亮手电，凝视左腕上那块刚刚校正过时间的手表。

刨坑工作时断时续地终于完成了。河本亲手将炸药包轻捷而熟练地送入坑中，又安上导火索，退下药线圈，将线贴地牵放，拉入就近的高粱地深处。与此同时，另一名军士小心翼翼地用坑边土石把炸药包掩盖起来。炸药埋好后，河本又细细查了一遍，才按灭手电吩咐道：“快，分散隐蔽！”军士们连忙将手中的作业工具连同手套丢在地上，迅速跃入铁路边的密密高粱丛中。

不一会儿，只听汽笛长鸣，自长春南下的 14 次快车，朝着柳条湖村急驶而来。河本中尉紧张注视着急速逼近的火车头顶上的那团眩目光束，心中估算一阵，然后点燃导火线。只见明亮的火星顺着药线，在昏黑的夜色中闪跳着冲向铁轨。继后，一声巨响盖过了火车奔腾的呼啸声，刺眼的光团划破了柳条湖村的宁静夜空。借着这瞬时突现的亮光，河本迅速向左腕上的手表一瞥，

但见表盘的时针和分针分别准确地指在“10”和“4”字刻度上。

被炸药掀起的土屑和碎石，早已四处飞溅。那节挨炸的车厢，被震得急剧地颠簸起来，但却奇迹般地倾斜着，飞过了爆炸后的铁轨，车厢内的旅客惊恐得乱作一团。车头仍拖着巨龙般的身躯，朝着终点——沈阳城奔去。这时，河本从地上爬起来，摇通随身携带的军用步话机，先后向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奉天日本特务机关报告：“成功了 成功了 !!”

这就是 1931 年 9 月 18 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22 点 20 分，发生在中国东北南满铁路柳条湖村的爆炸事件，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的真相！

但是，事情并非像河本所言的那么“成功”。本来，日本军方计划炸毁铁轨、颠覆列车，诱使中国东北边防军出营搜索，以此作为对华挑衅与进攻的借口。现在，列车既未被颠覆，北大营内的东北军更无动静。

有意滞留沈阳待变的板垣征四郎得知爆炸结果后，只好立即命令重炮队：“炮击北大营！”两门先期从神户运来的 24 厘米口径的榴弹炮，标尺早已瞄准了中国东北边防军营垣。命令一到，炮击立刻开始。

接着，板垣下达了攻占北大营和夺取沈阳城的命令：“（一）由第二独立守备大队岛本中佐率队攻打并扫清北大营之敌；（二）第五独立守备大队从北面攻夺北大营，并接受第二独立守备大队岛本中佐指挥；（三）第二十九步兵联队联队长平田幸弘大佐负责攻取奉天城。”

与此同时，在柳条湖村外，奉命监督爆破作业的今田新太郎大尉听到爆炸声，即率兵赶赴作业现场，摆上事先伪造好的四具身着中国东北军军装的中国人尸体，以充当爆炸铁路而被当场击

毙的案犯。随后，他又率领片冈、奥户和中野等一批满铁雄峰会①狂热分子，冲向北大营。这时，等候在爆破地以北 4 千米外文官屯的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三中队，也在中队长川岛正夫大尉率领下飞速赶来，会同攻打北大营，一道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罪恶战争。

其实，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国由来已久。早在 1904 年 2 月至 1905 年 9 月，日本和沙俄就为重新分割中国东北和朝鲜而在东北境内进行了日俄战争，并取代了沙俄在东北的支配地位。此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又多次参与了分裂中国的“满蒙独立活动”。1927 年 7 月，田中义一内阁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密呈日本天皇——此即“田中奏折”。奏折提出了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总构想，即“惟欲征服支那（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刻的“九·一八”事变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实施“大陆政策”的序幕。

按下日军的侵略行径缓表。单说此时，从沈阳市菊文饭店走出了一名日本少佐。他就是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他刚刚在饭店参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

各位可知，建川美次为何来到东北呢？说来话长。建川美次曾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在 1931 年初，拟定了《昭和六年（1931 年）度情势判断》，并受命于 4 月初在东京军部召开的师团长会议上作了扼要传达，强调“帝国国策就是不失时机地获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等”。不久，他即将适应中国东北气候的第二师团调入东北换防。6 月 11 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和次官杉山元中将决定：由情报部长建川负责，加上陆军省军事课

①此系南满铁路的一法西斯小团体。

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课长山胁正隆、欧美课课长渡久雄和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共同组成“满蒙”问题审议机构，以尽快制定对《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的实施方案。6月19日，建川等人就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7月，军部密令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专程赶回东京，亲自将此大纲带回中国，作为指令传达给进驻中国东三省的关东军。

这个时候的中国，却正在酝酿更大规模的内战。6月13日至15日，国民党召开了三届五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全力消灭赤匪决议案》，要求各级党部务必“集中心力完成剿灭赤匪之工作”，必须“不懈不挠，有进无退”。又公开发表了《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宣称：“赤匪既为吾民族之大患，自非谋全国一致之力量以扑灭之不可。”蒋介石还公然宣称：“惟今日中国唯一之敌人为‘赤匪’，中央现在决以全力扑灭”；并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声言：“‘赤祸’是中国最大祸患。中正秉命党国，督率军旅，誓集全国之力，弭此民族巨患”；他发誓说：“只要我一息尚存，决不忍轻弃职责。”

随后，蒋介石集中30万大军，自任总司令，并前往南昌，主持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军事“围剿”；扬言：“誓在短期内根本铲除赤祸”。7月2日，他又到抚州前线督师围攻中央苏区。

乘此中国内战之机，日本人则在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村，制造了挑拨中、朝民族关系的争地引水事件。随后，又出动日本警察镇压，致使中国农民数十人死伤，十余人遭到逮捕刑讯。还借机在朝鲜的汉城、仁川等地煽起排华流血事件。这就引起中国东北及关内各地民众的极大愤慨。

可是，7月12日及13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监察院院

长于右任相继密电张学良，令其对日本在东北之种种挑衅行为，须“极力忍让，勿生事端”。因为“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于右任更嘱张：“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对此，张学良复电表示：“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

随后，7月23日，蒋介石又在南昌行营发出《告全国同胞通电》，号令全国：“在此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必期于最短期内剿灭赤匪”，还宣称：“赤匪有一天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

可是，日本却力图乘中国内战之危，坐收渔人之利。8月1日，即调曾任张作霖顾问和驻华武官的本庄繁中将接任关东军司令官，又令建川转任作战部部长。建川到职后，即指示作战课长今村均着手制定侵略东北的作战方案。8月4日，本庄繁参加军部召开的军司令官和师团长会议后，启程前往中国旅顺上任。

本庄繁一到任就大呼：“满洲形势紧张，必须做好应变的准备”，还暗示：“如有可乘之机，应立即抓住。”他分别听取了张学良顾问柴山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汇报，审查了为执行《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由关东军参谋部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主持拟定的《作战计划方案》。随即，派板垣征四郎和花谷正携此计划方案赶回东京，向参谋本部汇报。

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次长二宫治重中将和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一道，听取了板垣的汇报，审阅了关东军的《方案》。方案将关东军行动时间预定为9月28日，即待高粱收割完毕后，以利于作战，并要求：“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

这时，又发生了“中村事件”。中村震太郎本是日本参谋部情报课情报员。1931年初，他奉命潜入中国东北兴安岭、索伦山

一带，在井杉延太郎等人协助下，进行军事间谍活动。6月26日，被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属下士兵查获。在审讯中，因其罪证确凿而又态度嚣张，激怒了参审官兵而被击毙。

日本军部随即决定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扩大事态，进行侵华舆论宣传。8月20日，南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武力解决”的主张。重藤千秋委托前关东军高级参谋“皇姑屯事件”的策划人河本大作潜往奉天，给花谷正送去事变机密费5万日元。河本返日途中，又受板垣委托，先后赴大连‘满铁’本社和设在汉城的驻朝日军司令部，转达关东军的要求：“事起立即行动。”9月7日，参谋本部一些军官公开煽动对中国“进行打击”。同日，日本军第十六师团第三连队飞机在日本福井、金池、富山和松本等地，空投了10万张《醒来吧，国防！》的传单进行响应，鼓动战争。

可是，面对日军对东北日益进逼的严峻局势，蒋介石8月22日在南昌讲演时，居然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9月12日，蒋介石又乘专车北上石家庄，召见张学良。蒋对张说：“汉卿，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

这时，日本若槻内阁中的文职阁员们，对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武装入侵东北并公开地加以占领的方式，提出异议。他们担心关东军的行动方案，会把日本拖入一场尚未充分准备的战争泥淖之中，认为：“吞并东（三）省，无异吞一炸弹。倘若一味鲁莽地以兵力推进，必陷我于孤立地位，十分危险。”外相币原喜重郎当

面向陆相（即陆军大臣）南次郎质询说：“头山满君刚自满洲回国。他说，有人把钱交给板垣，让他在满洲搞个重大事变。这是不是真的呢？”为此，9月14日陆军三长官——陆相、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便在参谋本部商定，立即派作战部长建川前往中国，向关东军司令部传达内阁的‘停止军事行动’的指示：“要他们在今后一年里，隐忍持重。”

但是，对这一指示，建川却另有想法。行前，他向密友、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作了暗示。桥本随即急令值班室根本博中佐，以他的名义密电板垣等：“消息已泄，立即抢先动手。”板垣和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得电后，立即紧急磋商。石原认为：“中国当局目前其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洲问题恐难作出强烈反应。”接着，桥本的第二封密电又到了：“必须在建川到达奉天（沈阳）前，坚决行动。”板垣等人决定立即动手！

9月16日，建川从东京出发。但他并不直达沈阳，却中途先在本溪湖站下车停留。板垣特意前往本溪湖秘密会见建川。返回沈阳，桥本的第三封密电又到了：“国内不必担心，应坚决行动。”于是，关东军开始实施6月底订出的行动计划：17日拂晓，关东军派出一个工兵中队，开入柳条湖地区警戒，隔断了交通。中午时分，抓住了由该地区横跨铁路的八名农民，强迫他们穿上了东北军的半旧军装，对他们说：“你们违反了铁路的戒严令，罚你们修铁路半天。”并拍了好多照片，注明：“中国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不久，日军用机枪打死了四个农民，又抓走了四人，也拍了好多照片，注明：“东北军破坏铁路，被日军发现后的战斗情况。”最后，把被抓走的四个农民也枪杀了，并拍上照片注明：“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的应有下场。”

同日下午，关东军炮兵开始进入设计好的阵地。南起浑河铁

桥、北至柳条湖铁路沿线，日军都安排了重炮，并以沈阳（南满）站二楼为发炮的指挥所。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板垣、石原和花谷又进行了密谈，板垣二人还委托花谷：“建川部长明天晚上将由本溪湖抵奉。你前往火车站迎接他后，直接送他下榻菊文饭店。次日，再安排他与我们会见！”花谷遵嘱于 18 日晚间，将建川一行从车站迎送到菊文饭店休息。

花谷一边陪建川喝着酒，一边暗中试探他的意向。见建川丝毫没有反对的表示，花谷便告辞。建川点头答道：“我到了中国，很高兴。请转告板垣君，我明日定去拜晤！”按下建川一行不表。

再说花谷正从菊文饭店驱车急返特务机关。车刚停，他便跳出车门，直奔办公室。值班官佐忙将通话记录簿呈上。花谷一目十行地扫看后，立即用当时停留在安东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的名义，同时向三宅光治和日本陆军省，拍发了内容相同的第一封电报，诡称：“18 日晚 10 时半左右，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以西，破坏了南满铁路线，袭击了我方守备队，与我前往之一部守备队员发生了冲突。根据报告，我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正向现场出动。”

11 时 50 分，本庄繁中将读到了三宅亲自送去的花谷正电报，得知预谋已在实施之中。各位可知，本庄此刻为何竟会安坐旅顺呢？原来，16 日他得知建川启程赴华的军部通报后，也曾打算赶到沈阳迎接。但建川却在出发之前，先将陆相南次郎给本庄的亲笔信派人特地送达旅顺。陆相在信中嘱咐本庄说：“要慎重地干！”他由此悟出了建川的用意，便蛰居旅顺司令官部，静候奉天（沈阳）城生变。

此刻，本庄稍作考虑，便摇通电话，向沈阳的板垣了解情

况。板垣也和花谷一样，贼喊捉贼地说：“东北军已炸毁了南满铁路，为确保南满铁路的安全，我已下令出兵应付。”本庄繁又装模作样地将板垣训斥了一番。板垣硬起头皮听完提出：“东北军人数众多，请求命令第二师团增援沈阳。”本庄表示：“可以同意考虑增援之请求。”

在本庄主持下，关东军司令部召集了紧急会议。会后发布了一连串应变命令。首先，命令驻辽阳的关东军多门第二师团司令部率长谷部第三旅团和天野第十五旅团，速向沈阳出击，尽快攻夺沈阳城。其次，令驻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司令部及所属六个独立守备大队，整装待命。再次，命令军司令部人员立即进行迁移准备，一得通知就登上军列，转往沈阳。最后，还去电汉城驻朝日军司令部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将，请求派兵进入中国东北增援。

与此同时，佐伯文郎中佐也赶到了大连。他前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代表关东军司令部宣布，组成关东军与满铁联合临时线区司令部，统一指挥并具体组织紧急军运，以配合战争的军事调动。

再说这北大营的守备部队，是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七旅，旅长为王以哲。第七旅素有模范旅的美誉。9月18日，正是全旅发放薪饷的日子，全旅上下闹腾了大半天。晚上9点，熄灯号吹过，士兵全部就寝，营垣立即一片寂静，只有巡逻的哨兵在营垣游动。当南满铁路柳条湖村的霹雳巨响传来，北大营的七旅官兵被爆炸声猛然惊醒。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派人到营门和西垣侦察，一面电告各团部及军士队、步兵研讨班和骑兵连的长官，命令他们切实掌握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并就地集中、待命行动，同时与当天没有在兵营的旅长王以哲联系。

侦察人员很快查明：日军在火炮支援下，已从西垣向北大营

区进犯。赵镇藩即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飞电报警。荣臻得报后，立刻急电呈报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和北平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请示对策。

当年，国内曾盛传这天晚上，张学良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和电影皇后胡蝶通宵达旦地跳舞。

国民党元老、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就曾经根据这一传闻作了两首诗，于同年 11 月 20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刊出。其中一首为：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其实，这天晚上，张学良在煤市街中和戏院的包厢中，陪夫人于凤至和五姨妈观看梅兰芳主演的全本《宇宙锋》。大约 23 点许，侍从走进戏院右楼第七包厢，俯身向少帅道：“报告副司令！沈阳急电……”听毕，张学良即带上秘书赵媿等走出中和戏院，跨进座车，直奔协和医院。

少帅为何要去协和医院呢？原来，1931 年 5 月下旬，张学良患了重伤寒病，便到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9 月初，他大病刚愈，但因身体仍感虚弱，便仍留住医院继续调养。

张学良一行回到协和医院居室后，侍卫副官长谭海便送上十万火急的电报，说道：“副司令，荣参谋长刚才来的电话，和秘书处收到的这封电报，内容大体相同。只是要求立即答复。”

少帅接过电文一看，内称：“驻奉天南满路日军联队，突于昨晚 10 时许，攻打我北大营，并诬我军炸毁了南满柳条湖段铁轨。现又向省城进攻。我已同时电呈军政部报告请示。望速回示机宜！”

张学良读完电文，怒不可遏：“日本人真是欺人太甚！”又对机

要秘书郭维城说：“小郭，请挂行营秘书处机要室洪钊主任，要他直电王以哲，传我的命令 固守北大营！”良久，郭维城回报：“副司令，行营与沈阳的电话断了！洪主任说，蒋总司令已发紧急电令！”张学良忙问：“什么内容？”赵媿答道：“总司令电令说 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

听完，张屈身坐下，一时默然无语，几乎使室内的空气都凝结起来。良久，他才长叹一声，左手将沙发扶手一拍，走向办公桌媿笔拟写了致参谋长荣臻和省长臧式毅的电令稿。令称：“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我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本是义不容辞的！但观今日情势，务遵委座电示，无论日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予反抗。留待中央向日交涉，以免事端，遗彼口实。此复。张学良。”写完又复读一遍，并在纸头加上：“十万火急，限即刻到。”然后张向谭海一挥电稿，有气无力地说道：“请洪主任照发！”并补充说：“副官长，再叫秘书处通知在平将领，即刻前来我处开紧急会议。”

再说沈阳郊外的北大营。事变前，王以哲发现南满路上，日军调动频繁，在乡日军^①都分发了武器，沈阳小北边门外通向北大营路上的沙土坑一带，气氛也显异常。他便在旅部召集连长以上的军官开会，商定了一些对策，以应付意外。首先，将北大营四周的土围墙，划分为各团的守备地段；又以练习土工作业为名，在营垣抢筑了各种掩体工事；还在北大营北小山一带，构筑了野战工事。此外，为免日军寻衅，更严禁士兵入城。有事进城者，请假后还须由官长率领，并不准走小道沙土坑；士兵胸章的背面都加盖了各连长图章，以防假冒等等。

^①本系日本预备役军人的特定称呼，此处泛指日本在东北的侨民

事变既起，各团、队都在守备地段加派军士站岗放哨，并按旅部命令备战待命，准备迎敌。谁知午夜前后，旅部召集了各团、队的长官紧急会议。会上，赵参谋长手持一纸，高声道：“现在，我代表王旅长宣读命令。军政部电令：‘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免事态扩大起见，抱绝对不抵抗主义。不许冲突！’”然后，又振臂摇着手中电文，怒吼道：“这是中央电令，听到没有！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回兵械库！”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六二〇团团副朱芝荣低声问道：“日本人如果打进营来，怎么办？”赵镇藩回答：“旅长从城里来电话说，总部荣参谋长指示，日军进入营房，由官长出面交涉，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起事端，谁负责任。”不知是谁小声咕哝说：“不要打，难道日本人要命也给他吗？”这句话如水溅油锅，会议室议论纷起。有的说：“不能还击，那就眼看着咱们的弟兄都被打死吗？”有的问：“为什么让小鬼子这样欺负我们？”有的气愤道：“不许冲突，我们就该等死吗？”一时间，群情激愤、人声鼎沸。

赵镇藩端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倾听着，硬撑着。等到会议室重归寂静，才又起立，低着头不胜悲怆地说道：“弟兄们，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说完泪如泉涌。他又哽咽道：“拜托各位了！”全场一片抽泣，大家挥泪散去。

这时，靠着火炮支持的日本守备队，已经推进到营西边的围墙外，正在包围突进，冲锋号、前进号吹个不停，西围墙附近，已是枪林弹雨、火海一片！接着一阵爆炸声，西围墙塌了一段。

日本守备队乘隙冲入了北大营。首当其冲的六一九团和步研班营房里，枪声大作。官兵们激于民族的义愤与军人的天职，仅靠着陈旧的步枪、机枪和常备手榴弹奋力自卫。但是，营垣既被突破，日军蜂拥而入，实在难以固守退敌。加之，旅长王以哲从

电话里向赵镇藩又转达了张学良的最新命令：“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无论受日军何种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免滋事端。必要时，可以退出去，留待政府向日军交涉，免致无谓牺牲。”赵镇藩听后，只得分派传令兵前往各团、队部传达，并部署撤营方案。

9月19日凌晨2时许，第七旅官兵开始撤离北大营。日本守备队第二大队竟以区区的500兵力，夺占了北大营西北隅。而会攻沈阳城的日军第二十九联队，此时进达小西门外。

花谷正得悉以上战况后，又拟发了第二封电报，谎称：“北大营之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线，其兵力有三四个中队，随即逃入兵营。我虎石台第三中队，11时过后，正在与北大营之五六百之敌交战，并占领其一角。但敌军正在不断增加枪炮和野炮。我中队正在苦战。野田中尉身负重伤”云云。关东军司令部收到电报后，即飞电通令攻打沈阳的各部日军：“加速推进，免误战机。”

再说北平的张学良，正在主持紧急会议。会议进行中，谭海又将蒋介石一封急密电文送到少帅手中。张学良便向与会人员作了宣读：“汉卿：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中正。”接着，他说：“日人图我东北，由来已久。这次举动来势很大。我们守土有责，理应和他们一拼。但日军不仅一个联队，绝非我东北一隅之力能够应付的。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只可照中央指示办理。”到会将领深以为然。会议在凌晨2时许结束。

会后，张学良叫来谭海说：“副官长，以我的名义再急电告荣参谋长‘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今须听命于中央，为免无谓的牺牲，关外我军，梯次南撤，退向长城一线，保存实力，以待时机。’”谭海随

即将电文发了出去。

北大营内。旅部的撤营命令下达后，官兵反应迥异：有的团、队立即召集会议，部署撤退；有的团、队，兵不听命。他们都持枪实弹，怒目圆睁，狂呼不止，恳请一战。有的甚至挥拳击壁、抱枪痛哭，最后还派出代表，冲向旅部，围着赵镇藩，要求撤销退却命令，发誓要与北大营共存亡！

赵镇藩目睹耳闻，百感交集。可是，经过夜半激战，全旅伤亡中校以下官兵已达 290 余人。而且，军令既难违抗；坚守，也只是无谓牺牲。他强忍悲愤，口气近乎央求地道：“弟兄们，中央又有令来，命令说‘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请想想看，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遵令撤离。请相信我吧！此仇不报，羞为军人！”在他的劝说下，第七旅各部边打边撤，到拂晓前后全部撤离北大营，退向东山嘴子和山城镇方向。19 日凌晨 5 时 50 分，第三守备大队日军在由铁岭驰援的第五大队配合下，才把北大营全部侵占。

再说张学良躺在协和医院的床榻上，一夜辗转反侧。次日凌晨，又让赵媿叫来谭海，他望着谭海一双充满血丝的肿眼问道：“沈阳怎样了？”谭海回答：“荣参谋长已经按副司令和军政部的电示，下令退出沈阳城！”张学良听后凝神不语，良久，叹道：“我们对不起东北的父老乡亲啊！”

在旁伺候的赵媿，见张学良神色凄然，心中一酸，却又连忙强压愁绪排解道：“副司令，这是中央负我 3000 万东北民众啊！蒋委员长不是早有‘铣电’之令么！”接着，便从身旁的蓝色电报夹里拈出一纸，递给了张学良。其实，这封 1931 年 8 月 16 日密电，张学良早已熟读成诵。但此时，仍接过电文又看了一遍：“汉卿兄：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

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中正。銑。”他把电文小心地收了起来，不住地摇头叹息。

但是，沈阳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柳条湖事件发生之后，满铁本社首先将驻辽阳的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和驻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等三个司令部的指挥人马，先后运迁沈阳，使他们拂晓前负起了军事指挥责任。多门二郎师团长指挥抵达沈阳的日军和守备队兵力，于 19 日晨 6 时，完全占领了沈阳城。荣臻等微服逃走。臧式毅等近 10 名大员被俘。破城日军，军纪废弛，恣意杀戮民众，大肆抢劫公私财物，轮番抄查民宅。据不完全统计，全城的官方财产损失即达 18 亿元以上。尤其严重的是沈阳东北军的已装成和未装成的飞机 262 架、火炮 3000 多门、战车 26 辆、步枪和手枪近 12 万支、机枪 5800 多挺，大部分完好地落入到日本侵略军手中。一夜之间，沈阳沦陷。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二回

众学子敦请抗日 蒋介石被迫归乡

书接上回。9月19日上午，沈阳沦陷的消息传到了南京，但却一时群龙无首。因为9月18日，蒋介石正乘‘永绥’舰离开南京，前往江西督师内战。此时，在湖南衡阳以南地区，蒋系军队与粤桂联军也在对垒争战。南京城里只有于右任、戴季陶、朱培德、吴稚晖、邵元冲、朱家骅、王正廷等一批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看家’。

于是，他们连夜举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紧急磋商对策。最后决定：首先，急电照知赴赣“剿共”的蒋介石“即日返京，共议内外应付之策”；其次，责成外交部电传日内瓦，指示出席国际联盟第十二届大会的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应向国联控告日军侵略中国东北领土，敦请大会主持公道。”第三，委托张继等三人代表中央“与粤方同志联络”，谋求息争和解。

会后，张继、吴铁城、李石曾便致电广东国民党领袖人物汪精卫、孙科等，声称：“此时此际，国家民族之利害，实超出一切利害之上。今日惟有剿共、救灾、御外三事。请停战议和，共赴国难。”

各位可知，南京党国要人通电中的“停战议和”，所指何事？原来，1931年2月28日下午，蒋介石特邀请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前往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的蒋氏私邸，商谈党国大事。可是，在此之前，蒋介石企图利用召开国民会议和制宪法

的公众舆论，达到他自谋总统职位的目的，却遭到胡汉民的反对。这次在商谈中，他们又再起矛盾。胡汉民仍坚持要实施由他拟订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确保实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五权分立’的原则。并且，他还不无所指地强调：“五权分立，是孙中山先生的基本建国主张。”结果，胡、蒋二人唇枪舌战、各不相让。蒋介石怒不可遏，最后竟然叫来侍卫长王世和，将胡汉民强行押送到蒋的汤山别墅去“休息”。

消息传出，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棻，赶往汤山探望。胡汉民同他一阵耳语。古应棻告退后，即连夜挂冠出京，去了广州。他先行联合林森等四监委，发表了《弹劾蒋中正提案》，历数蒋氏罪状：“横征暴敛，罔顾民生；排除异己，制造事端；毁法乱纪，动摇国本；厉生独裁，奴役人民。”后又联络国民党内的文官、武将、元老、少壮等反蒋派系的头面人物，于5月在广州举行了国民党非常会议，建立了两广系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队伍，宣布：“誓师北伐，去打击个人独裁。”这就再次造成了国民党内的蒋系和支持胡汉民的粤、桂系的对峙。由此之后，国民党又一次出现了宁（蒋系）、粤（两广系）分裂的内讧局面。特此补充交待如上。

再说，蒋介石得悉“九·一八”事变消息后，立即在9月21日，从南昌赶回南京，紧急召集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商讨对策，并议定：对内争，电令何应钦停止率兵入湘，委派陈铭枢、张继携蒋介石亲笔信赴广州与粤桂系议和；对外侮，专设特种外交委员会，由戴季陶、宋子文分任正、副会长，负责对日交涉的决策。随后，又授意吴稚晖、戴季陶出面，前往双龙巷胡汉民家，劝其“销假视事”，以示和解。但胡汉民执意不出，仍以病重相推托。